

空间隐喻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评小说《活着之上》

张春歌, 张玉玲

(江苏理工学院 中文系, 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 小说《活着之上》将主人公的日常行为放置于三个主要的空间来呈现: 鱼尾镇、大学和门头村, 它们共同呈现着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变异。鱼尾镇, 由对死亡的叙述来凸显活着的有限性, 成为引领全篇的关键空间; 大学, 是小说的主要表现空间, 多方面表现了世俗化生存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全方位渗透; 门头村, 则是小说精神指向的意义空间。三个空间在小说中相互交织, 真实还原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同时更深化了文本的意义。

[关键词] 《活着之上》; 知识分子; 空间环境; 生存境遇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8)01-0087-04

Spatial Metaphor and the Living Circumstances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Remark on the Novel *Beyond Living*

ZHANG Chungge, ZHANG Yu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1,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Beyond Living* places the protagonist's daily behavior in three main spaces: Yuwei Town, University and Mentou Village, which together present the intellectuals' survival predicament and spiritual variation. Yuwei Town, by the narration of death to highlight the finiteness of living, has become the key space to lead the whole article; The university is the main expression space of the novel, which shows the all-round infiltration of the secularization existence to the intellectuals' daily life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in many aspects. Mentou Village is the meaning space of the spirit of the novel. The three spaces interweav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novel, and the true restoration of intellectuals' living state at the same time deepens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Key words: *Beyond Living*; intellectual; space environment; living circumstances

《活着之上》是阎真2014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因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的真实呈现而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综观学界对其的评论, 多是从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影响的角度来发掘其主题意蕴及社会意义, 研究

者对主人公聂致远对道德良知与学术理想的坚守达成了共识, 却忽略了小说中的空间环境对文本意义的生成作用。小说是时间的艺术, 在叙述者历时性的叙述中完成文本的意义建构。小说中的叙述行为和连续性的过程总是产生于结构性的空间形

收稿日期: 2017-05-26

作者简介: 张春歌(1977-), 女, 山东菏泽人, 江苏理工学院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玉玲(1969-), 女, 山东淄博人, 江苏理工学院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式中,小说从而具有一定的空间维度。任何一篇小说,都隐含着作家对时间与空间的理解与认知。在《活着之上》中,主人公聂致远的上学、考博、结婚、工作等这一人生轨迹成为贯穿小说的主线,作家也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推进小说情节的逻辑发展的。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作家让主人公穿梭于鱼尾镇、大学与门头村的空间环境中,并以大学为主要空间焦点,通过与其他空间的相互渗透来表现以聂致远为代表的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及精神变异,这种空间设置充分展现了主人公不同的生存状态与主体意识,拓展了文本的意蕴。

一 鱼尾镇:生死之间的思考

“文学作品中的场景环境描写,并不是客观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的简单机械式再现,其中渗透着人们对于空间的理性规划和社会历史性理解。”^[1]鱼尾镇,尽管是一个狭小的寂寥的小镇,却在文中起着关键作用。它不仅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于偏僻小镇的延伸体现,更是主人公聂致远现实窘境的进一步延伸;它与大学这一空间相互印证,共同展现着聂致远的生存与精神窘境。

首先,由死亡凸显活着的重要性。作者在小说的开篇就通过聂致远的视角写出了小镇上人的生存状态,对小镇丧葬风俗的描写,更是成为全篇小说情节推进的关键。作者由两种死亡的叙述来展现对生命有限性的思考以及对活着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从而体现小说的核心要素“活着”。小镇上人的常态死亡和爷爷的死亡,带给聂致远最初的生死记忆以及对活着的理解,他在这里初步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有限,意识到有限的时间里如何活着是非常重要的生命问题。作者缜密与巧妙的构思引出了全篇的核心命题,而且表现了聂致远对人之生死的最初认知。人情和面子是小镇上大多数人活着的理由、活着的意义,更是活着的方式。相较于他人,爷爷体现出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为了区别这两种方式的不同,作者使用了鞭炮和《石头记》这两种意象引发对活着的思考。鞭炮,象征了一种世俗的存在,热闹的响声维护着死者最后的尊严,更显示着生者的人情和面子;《石头记》,象征了一种精神的存在,在世俗的鞭炮声中显示着一种精神的清高和孤傲。尽管爷爷的去世也伴随着热闹的鞭炮声,但是《石头记》作为爷爷的遗物更显示了爷爷精神世界的与众不同。作者让世俗的生存与精神

的追求共存于聂致远的幼年记忆中,并将两者纠缠于聂致远以后全部的生活之中,着重展现世俗生存压力下主人公的焦虑心态与行为失范,由此深入探究以聂致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小小的鱼尾镇既是世俗化生存的一个缩影,也是体现聂致远生存与精神双重困境的关键空间。

其次,生存个体与知识分子身份内在要求之间的冲突。鱼尾镇,不仅是小说叙事的起点空间,也是体现主人公聂致远作为生存个体与知识分子身份内在要求之间相互冲突的空间,见证了聂致远的生存困境及精神的焦虑。作者着重叙述了聂致远工作后两次回家乡的经历。第一次回家,聂致远被弟弟央求给任镇办公室副主任的高中同学拜年,这让他感到一个博士竟然不如一个镇办公室副主任那样被尊敬、重视,在尴尬之余,他更多地是感到难以言说的不平与愤慨;第二次是聂致远评上副教授后回家过年,任镇办公室主任的弟弟受到各种人的巴结讨好,父亲的一句“是博士大呢,还是镇办公室主任大”蕴含的轻蔑与不满让聂致远引以为傲的知识分子身份彻底坍塌。聂致远作为普通个体的生存需求与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之间的抗衡成为牵制其日常行为的关键所在。坚守还是妥协,已成为聂致远心理矛盾的常态。

二 大学:现实与信仰的纠合

在《活着之上》中,作家将情节主要设置在大学这一空间,尽管这也是出于作家自身大学生活体验的考虑,但是大学空间的独特性也的确赋予了小说更多的意蕴,使其更能表现市场经济下人文知识分子的内在隐忧与焦虑。

首先,小说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世俗化生存的冲突。在小说中,聂致远一直强调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并且对这一身份所应具有超越世俗的精神立场十分赞同与肯定。他一再强调自身的学术理想:“我想要的就是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把前人的事迹和思想,整理得清清楚楚,告诉后来的人。”^[2]成为历史学家,是聂致远自我学术身份的定位,也是其生存价值的主要体现方式。这种人生理想与传统文人的“内圣外王”有着本质的区别,缺少了入世与出世的自由融通;它也与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有着本质区别——缺少了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浇灌,一旦遇到现实的波动就很

容易坍塌。尽管聂致远一直以传统文人曹雪芹等的人格情操作为衡量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杆,作家也有意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传统文人进行比照从而凸显作品主题,但是商品社会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公共关怀等逐渐从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脱离,知识分子希望精神世界独立的理想已越来越渺茫。比如读博,对聂致远而言仅是摆脱尴尬现实的跳板;到大学任教,也只是无路可选的选择。功利化的生存现实逐渐将聂致远挤压到封闭的学院中,他唯有通过学问的研究才能获取存在的尊严与价值的实现。此时聂致远的存在感不过是将自己与街边炸油条卖衣服之人进行比较后而获取的一点心灵安慰而已,所谓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已逐渐模糊在世俗的生存之下。

其次,小说表现了知识分子与权力化生存空间的矛盾。福柯曾明确指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3]大学,在阎真的笔下已成为权力为主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高校教师总是因受到权力的牵制甚至规训而丧失最基本的话语权。作为大学教师,聂致远本应在教学、成绩评定、班委评选、助学金评选等工作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由校长—院长—院长助理—副书记等组成的权力关系圈却把他层层包围,就连简单的成绩评定他都要受到权力关系的干扰,严酷的现实逐渐使其内心世界彻底失衡并最终向现实妥协。为了进一步凸显由于权力关系的纠缠而导致的价值底线坚守的艰难,作者对聂致远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细腻描绘,充分展现了其在现实困境中承受的纠结、挣扎。显然,作者希望借助于传统文人的品格重塑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似乎想以此来重新激活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重建一个时代的道德伦理与精神信仰。”^[4]但是透过聂致远复杂的内心世界,我们看到的却是权力阴影下学术理想的逐渐滑落、知识分子身份价值的坍塌。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环境被浓厚的名利氛围所笼罩,教师被错综的权力关系所左右,直接导致了人才培养的失败。有学者认为《活着之上》的社会学价值就是“当作为正式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在集体堕落时,更大的灾难性后果是,一个文明社会所需要的人是更加难以培养出来了”^[5]。学生缺课却力图通过学院领导的关系改成绩,学生毕业论文抄袭却要求成绩优秀,学生不断质疑所学课程的用

处,学生表现出对赚钱的极度渴望,等等,通过这些现象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学生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在空间环境的影响下不断扭曲。

最后,小说表现了知识分子与市场的复杂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一些作家如张炜、阎连科、阎真等,从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出发,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文学的方式对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进行了想象性叙述,对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深入思考。与以往作品相比较,虽然《活着之上》依然立足于市场经济的时空背景,但是作家一改以往作品中主人公于生存压力下主动妥协、融入市场的叙述,对市场经济与人生理想正面碰撞下的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进行了细致描绘,侧重展示了知识分子与市场不和谐关系下的精神坚守问题。作家开始理性地审视市场经济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他并没有单纯地对市场经济及功利主义进行批判和否定,也没有将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全都归罪于市场经济,而是较为客观地将市场经济的运行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真实地描绘出来,并且以对良知的坚守来实现与市场力量的平衡,从而实现知识分子的精神建构。“我理解功利主义,人要活着,不可能没有功利主义。但我又不能承认功利主义的无限合法性。总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这就是良知。”^{[2]143}良知是作家选取的能够平衡市场力量与个体生存的方式,只是良知这条底线的不能触碰更像是市场经济下作家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道德层面的心灵慰藉,毕竟单纯的良知能否积极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还是一个无法预知的问题。不过,阎真在《活着之上》中对市场经济与知识分子间关系的客观化处理与呈现,却是对以往类似题材作品的一个突破。

可以说,鱼尾镇与大学两个空间相互印证,在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共同展现了聂致远的生存与精神窘境。从聂致远穿梭于这两个空间时的心灵挣扎来看,所谓的学术理想、人格修养与社会责任意识等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正逐渐让位于日常的生存现实,聂致远的存在已表现出某种悲情意味。

三 门头村:悲情中的有限坚守

门头村,是聂致远追寻以曹雪芹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精神的地方。作者将门头村的现代化进程与聂致远对古人精神的追寻进行了并置叙述,蕴含了他对现代化进程及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某种隐忧,所

以门头村是凸显小说文本意义的关键空间。小说写聂致远三次去门头村,充分展现了聂致远曲折的内心世界及心灵发展的轨迹。聂致远最初是从赵教授的评述中知道门头村是曹雪芹写《石头记》的地方,聂致远为曹雪芹不为名利的生存态度所感动,并开始质疑现实的自我及自我的生存。第二次去门头村,聂致远对曹雪芹的认知从最初的敬意上升到理性的审视。聂致远一方面佩服曹雪芹心灵的骄傲和清高为其赢得了个人心灵的尊严,另一方面却为曹雪芹于穷困悲伤中逝去而感到不平和痛心,也为自己不是像曹雪芹一样的人感到幸运。作者将这种心灵的矛盾放置于门头村的现代化进程中,显示出:伴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现实功利力量正日渐侵蚀聂致远这类人的日常生活及精神世界,他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精神正逐渐消退,责任、清高、意义正与生存本身发生着冲突。放弃或是坚守,已成为聂致远日常生活中的困扰,而且逃避或妥协正成为聂致远主要的生存选择。第三次去门头村,门头村已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丧失了原来的模样,此时的聂致远经历了日常生活的历练后也对活着本身有了更为明确的认知。作者将笔触深入到了聂致远的内心世界,将其对活着的理解与以曹雪芹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的生存方式进行了对照与评述,从而得出如何活着的结论,凸显全文主旨,深化文本意义。“好好活着,活在当下,一切与此无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2][137]},这是聂致远痛定思痛后对活着的理解与认识,虽充斥着对世俗生存的臣服,但也有对活着底线的坚守,即以“先行者的血泪人生昭示的价值和意义”为最上景仰,以他们的精神为指引自我生存力量。作家在面对强大的世俗生存的力量面前,选取了用道德的自我完善与现实对垒。

我们发现,作者将聂致远的精神追寻放置在门头村的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用意颇深。门头村被现代化消灭了本来的样子,但是聂致远在现代化的进程面前却坚守住了生存的底线,他选择用传统文人的精神来引领自己的生存方向,“企图从各种社会体制属性的羁绊中返回到有‘个性’的本己”^[6],这也体现了在功利主义的现实环境下坚守良知的艰难。尽管这与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境界相差很远,但这是一种作者认为能够用来有效平衡功利主

义的策略。对传统精神资源的固守,对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与理想信仰的景仰,在阎真的小说中是一以贯之的。早在2000年的《沧浪之水》中,他就描写了池大为父辈们对传统文人精神的坚守。只不过在世俗欲望的诱惑下,池大为最终选择了放弃传统人文精神而与现实妥协。在《活着之上》中,作者再一次将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作为谋求当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基,并将其视为解决当代知识分子世俗化困境的最好选择,由此可以看出,阎真对传统精神资源的充分肯定以及试图借此重新建构人文理想的努力。

鱼尾镇、大学和门头村,这三个空间是小说情节布局的关键,其凝聚着主人公聂致远各阶段的人生经历,诸如幼年、读书、工作、爱情、婚姻等。他每一阶段的日常生存与精神状态都是从中表现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个空间已不只是单一的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的场景,而是聂致远生活时间的空间化呈现。三个空间在强大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共同展现了以聂致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尽管小说描绘的是知识分子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但是三个空间在小说中的相互交织,在还原知识分子原生态生活状况的同时,也逐渐增强了文本的精神指向,深化了文本的意蕴,这也正是物化时代《活着之上》这一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1] 谢 纳. 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与当代文艺理论建构[M]//王 宁. 文学理论前沿:第7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3.
- [2] 阎 真. 活着之上[J].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5(1).
- [3] 包亚明.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3-14.
- [4] 李 振. 知识分子的困境与书写尴尬[J]. 南方文坛,2016(1):26.
- [5] 黄力之. “模范社会”忧思录:评阎真小说《活着之上》[J]. 创作与评论,2015(10):53-57.
- [6] 王 蕾. 学而优则仕:阎真小说的审美反思与创作取向[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5):10.

责任编辑:黄声波